

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

活跃在运河线上的林集交通站

邵景元

1941年1月,“皖南事变”后,华中局按照中共中央命令,重建新四军军部于盐城,并将部队调整为7个师编制。这7个师除五、六、七三个师分布于苏南、皖南、大别山地区外,其余4个师均在苏皖长江以北。根据战事需要,新四军军部于同年秋冬之间转移到阜宁县停翅港,1943年1月又由停翅港转移到淮南地区盱眙县黄花塘。

为加强和保证从宝应到淮阴一百多华里运河线上的交通安全,1943年2月,华中局交通科决定在林集设立“华中局交通科驻淮北淮宝县(林集)转运站”,对外称“林集区交通站”,委派李萍同志为站长。交通站于运河两岸尤其是河东沿线设立了若干秘密联络站点。从此,林集交通站成为华中局、新四军军部与抗日根据地苏中(一师)、盐阜(三师)的交通纽带。

1943年初的一天晚上,华中局交通科科长邓寅冬向李萍传达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的指示,须派人回军部原驻地阜宁停翅港,取回组织部干部科埋藏在那里的文件等,同时探望不能随军转移的伤病员。经领导研究,决定由李萍一人去完成此项任务。李萍同志身负重托,不畏艰险,在沿途淮宝县林集区、宝应县的张桥区、五分区交通站、盐阜区交通总局等机关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,经过二十多天的辗转跋涉,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待的任务。

林集交通站设立在淮安区林集镇利民桥(原名屠大桥)附近。建站不久,从淮宝县敌工部联络站调王建高来任副站长,成员有孙国喜、陈长江、张万国、张兆卓、李有用等同志。这些同志苦大仇深,忠实可靠,有较高的阶级觉悟。交通站承担的主要任务是:送发文件、信件、报纸;护送干部和部队渡运河;配合当地党政组织铲除汉奸、特务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,交通站内部作了具体分工,孙国喜(化名孙城)负责收发文件、信件,后来这一工作由赵来源接替;李有用负责后勤工作;张万国、陈长江、韩海道为通讯员。在武器装备上,李萍、王建高各配备一盒子枪、一支步枪,其他同志各配备长枪一支,手榴弹4颗。基本实现了组建武装交通队的愿望。刘瑞龙对组建武装交通很关心,连使用什么样的武器都考虑到了。他说:“边区活动,步枪不便,短枪好隐蔽。”还风趣地说:“子弹少,是暂时的,以后敌人会送来的。”在此之后,他们又先后得到张爱萍等部队首长给予的武器和弹药。

统 战

日伪军为切断一、三师与华中局、新四军军部以及与二、四师的联系,派重兵驻扎在宝应到淮阴的运河沿线,设立大小据点21个,其中泾河、平桥两地设有日军指挥部,运河里有十多只汽艇日夜巡逻。交通站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三项措施:一是利用来往盐行商人的关系,争取其配合。黄浦以北,戴家湾以南的运河段渡口,盐商在夜间驱运“私盐”往往通宵达旦。敌伪亦在渡口设“税卡”,用暗哨索,盐商有苦难言;而我们执行税收政策,保护合法经商,获得他们好感,在秘密渡河时就得到他们的配合。二是利用亲朋、友邻、熟人关系,以“良民”、“小贩”的身份出入伪军据点,掌握敌情动态,书写标语,散发传单。三是利用敌营中的不同派系和互相矛盾予以分化瓦解和利用。

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指引和感召下,交通

站同志成功地利用敌伪之间内部矛盾,争取了敌占区之镇、乡、保部分伪职人员和开明人士,由他们充当我们的“敌工”关系。这些人在为我方提供情报、沟通运河东西两侧联络方面,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。我联络站庄进、李飞、刘晓屏、李云、潘介和、陈福泰等同志,于淮宝县的盐北、林集、山阳等边缘区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,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在我方可用的“敌工”关系伪职人员中,多数是敌伪据点内外方的地方实力派人物,其大部分土地、家眷在我民主政权管辖范围。只要我们能配合我抗日游击活动,我们地方政府及联络、交通两站就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保护。这样做,就更利于我们发展“敌工”关系,扩大统战成果。例如,戴湾乡乡长戴镇江,交通站的同志就对他进行争取说服工作,使他愿意配合交通站的一些活动,甚至能以“个人和全家生命”来担保。一次,我军一个连的官兵经交通站渡河向东,渡船是从三太乡周庄找来的,必须船过堤下运河。第二天早晨,伪军发现拖船的印子,追查这事,戴乡长回答说:“这是做生意的民船过堤的。”伪军生疑,但又找不出破绽,就“自带舵”地说:“要小心共军,当心脑袋!”“共军来了要报告。”戴乡长一个劲地在口头上答应:“是,是。”

在统战工作中,交通站除对伪职人员做大量的工作外,还利用一切宣传手段,对伪军发动政治攻势。同志们到团子内外张贴标语,散发宣传品,向伪军喊话,如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、“你们是被逼出来的,你们也是穷苦人家出身”、“不要干坏事”等等。日本人在华共产主义联盟成员小房子曾到过泾河、平桥日军围子外边喊话,唱《国际歌》,以争取其转变。由于交通站同志积极开展政治攻势,有些伪军暗中支持我们,当我们护送人员过河时,他们当作没这回事,不打枪,不声张,不告密。

护 送

林集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党政军首长、重要人员和部队,传递文件、信件及转送武器弹药等物资。这个交通站曾护送过成批的干部,成连成营的部队,成百的学生,成包的文件和大量的物资,没有出过大的问题。即使有时出现了岔头,也能及时采取措施,予以弥补。1944年7月的一天,二师五旅供给部的同志渡河东去。由于渡河时紧张,遗失盒子枪一支,当时不便寻找。4天以后,失枪者回来查找,经过交通站的努力,终于物归原主。

同年冬,大运河水面结了厚冰,新四军一批大队人马踏冰过运河时,一匹马沉入水中。交通站通过戴镇江乡长出面,找来木板,横铺在冰面上,几个人合力拉拽,终将马救了上来。

护送干部有个规定,要随身带华中局或军部介绍信。介绍信的左下角有个括号,括号里可填甲、乙、丙、丁字样,也有不填的。若是“甲”字符号,即为高级干部,交通站必须与淮宝县独立团联系,至少派一个连部队护送;……若是“丁”字符号,大都是团级干部,由武装交通队护送即可;如无任何符号标志的,则由交通站派交通员为其带路。

1943年夏天,陈丕显同志从军部开会回一师驻地。途经林集区,他派人到利民桥王建高家联系渡河事宜。王建高立即找来鹤涧乡四保保长周四(原是周少甫的爪牙),要他迅速找几条船急用。周四心中不满,嘴里叽叽咕咕,但又害怕交通站,勉强答应去找船。这一

切被陈丕显同志看到了。他一边指着周四远去的背影,一边喊道:“王建高,王建高,这是什么人,他刚才骂你,不愿找船,你把他找回来控制他!”这时,周四自知势头不对,过河躲起来了。当王建高和一个警卫排长撑船赶到河东时,已找不到周四了。陈丕显指出:以后对这些人不可轻信,也不能轻饶。随后,王建高千方百计找来了五、六条船,拖到运河里,顺利地把陈丕显同志及随行护送的警卫连渡到河东岸。约过了三、五日,陈丕显同志发给交通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,表扬交通站的工作做得好,在敌人鼻子底下护送我方人员安全过河,为党立了大功。

1944年秋天,张爱萍将军从四师去三师路过林集区,淮宝县独立团二营周营长带一个连协助交通站护送。交通站派孙国喜带路,从戴湾过河,其他通讯员配合。由于事先沿途联系不够,运东地区我武装部队夜间行动与执行护送任务的先头部队发生意外“遭遇”,双方开了火,渡河未成。这样,张爱萍等同志不得不在林集小憩三、五天,住在利民桥附近屠大庄已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屠云鹏家里。张爱萍将军在寒风嗖嗖的深秋季节,坚持冷水浴,每天在屋前的屠河里展臂游泳,群众都为之赞叹。当同志们提到弹药少的问题时,张爱萍从几个警卫人员身上抽了17发盒子枪子弹送给他们。

部队过了运河向东,离河堤不远处碰到伪军孙侯甫自卫队的巡逻兵,王建高当即派一个警卫排包围他们,轻而易举地缴了他们的枪,并逮住了孙侯甫。孙和伪军们都说,他们同刘晓屏有联络,今天不晓得你们怎么路过这里。说着刘晓屏等人到达,孙的话得到证实,张爱萍同志就叫把枪还给他们。命令队伍继续前进。走了十多里路,到了杨三集,张爱萍同志问:“这里离敌人的据点多远?”王建高回答“离最近的敌人花园庄据点三里多路”。张指示“不休息,继续前进”。护送部队加快了步伐。

除 奸

交通站的同志在完成交通安全任务的同时,还配合区、乡政府抓好政权建设,开展武装斗争和党群工作。重点打击为日军卖命的汉奸、特务,扫除交通工作障碍,为民除害。

平桥镇位于淮安、宝应之间,踞运河东岸,西与林集区隔河相望。平桥据点内设有日军指挥部、特务队、自卫队,这对我交通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。一天,联络站站长刘晓屏向我交通站提供一个重要情报,即驻平桥据点内的“地头蛇”彭敬波,为谋取伪区长的宝座,向伪县长沙世章打了包票:向运河东西两岸推进5~7华里,建立伪乡、保政权;联合特务队头子翟六麻子,搞垮交通站和联防队,破坏林集区区、乡政权。彭敬波家住平桥东侧,曾与交通站的人有过接触,知道一些交通路线和联络关系,对交通站的威胁极大。于是,交通站、区队和联防队共同采取对策,决心除掉这个祸害。他们制定了一个除奸方案和实施办法。一天晚上,他们化装成伪军,李萍扮成长官,闯进平桥据点,活捉彭、翟等地头蛇。事先区队派一个班过运河东岸,潜伏在伪据点南门外,伺机行动;刘晓屏和联防队在平桥东门

外策应。李萍一行快到围子南门时,4人各点一支香烟,捏在手中,尽量遮住香烟的亮光。当他们离哨位十几步远的时候,嘴里含着香烟,大大方方地向南门口走去。哨兵喝道:“什么人?”“口令!”李萍把香烟一扔,用“长官”的腔调骂道:“他妈的!这会儿要什么口令!”说着即冲哨兵跟前,身后紧跟着三位大汉。两个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连忙“立正”,请“长官”进据点。王建高是平桥人,对街道较熟悉。四人进围子后,他主动在前面引路。进了围子里,发现家家户戶门都敞着,门板都被搬走作工事之用了,有的房子倒塌了。他们趁黑摸到彭敬波小老婆家,门也敞着,彭敬波和小老婆都睡得很死。当他俩被惊醒时,枪口已对着他们的脑袋。老奸巨滑的彭敬波自知无法脱身,假装满脸堆笑地说:“长官是从哪里来?有话好说。”孙国喜二话没说,即把彭敬波反绑起来,给他戴上礼帽,再披上大衣。彭的小老婆被捆在床腿上,嘴里塞上棉花团,并警告她:“要老老实实,不许乱喊乱动,彭先生明天可回来。”孙国喜拉着彭敬波,肩并着肩大摇大摆地向围子南门走去。南门口还是那两个哨兵,他们见到熟悉的彭敬波路同“长官”到来,又是一个“立正”礼,目送他们出了围门。

李萍一行离平桥围子不远,就下堆直奔芦营子方向。警戒在围子外面的区队一个班,见捉到了彭敬波,个个高兴不已。不料,围门口的哨兵生疑,到彭敬波家发现情况,即鸣枪示警,一时间围子里一片混乱,叫喊声和枪声连成一片。与此同时,停在平桥一带运河里的日军汽油艇也出动巡逻。情况突然变化,交通站同志们不由意识到,必须迅速离开危险地带,于是,他们加快了步伐。但是彭敬波耍赖,故意不肯走快,企图伺机。李萍考虑了一下,同王建高议定,改变原计划,决定就地处决彭敬波,然后再向上级汇报。他把枪决彭敬波的

任务交给孙国喜。孙国喜对彭敬波连打两枪,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。

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弘扬老区精神,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爱党、爱国、爱家和共圆“中国梦”的热情,7月1日下午,由建淮乡党委政府主办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“多彩淮安 幸福建淮”在建淮乡“城南一号”社区隆重举行。区区委会会长殷长干、副会长田文秀等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牛庆宝 武建国 赵炜 摄

明代状元沈坤抗击倭寇保家卫国

刘怀玉

沈坤是一名状元,是淮安人民的光荣,更是多少代读书人心中的偶像。但是,沈坤一生中最大的业绩不是读书做官,不是中状元、做翰林,而是抗击倭寇。倭寇即当年日本对华侵略者。

淮安历来是通海要道和沿海重镇,其所属海州、盐城、庙湾(今阜宁县城)都是海防前线。淮安又是漕运要道,因而成为倭寇骚扰的重要目标。每遇东南风,倭寇即飘洋而来,由庙湾窜犯淮安,奸淫杀戮,淮安人民受尽了苦难。倭寇闹得最凶的正好是沈坤在家给母亲守孝的那几年。当时淮安全城官兵、百姓都非常恐慌,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,偏偏这几年又不断闹水灾,淮安人民极端困苦。

此时,淮安有淮安、大河两个卫兵力。淮安卫有7个千户所(有两个千户所分别驻扎在海州和盐城),大河卫5个,按照明初的编制,兵力应有一万三千余人。但到了嘉靖年间,兵员流失严重,淮大两卫仅有2371人,加上盐城、东海、海州三个所1000余人,也不过3000余人。但凤阳巡抚可统的兵,还有扬州、高邮两个卫和通州、泰州、兴化、仪真4个所,兵力还有1.5万余人。同时,还留用了一部分客兵,即由外地招募和调集来的兵。据范梈墓志铭说,“时督府集兵5.7万人,分17营以御之。”巡抚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军营中,另外又招募兵勇3000人。这么多兵力,有巡抚、操江都御史等大员,和兵备道、指挥使,还有镇守淮安的总兵、参将参与统领作战,军事力量

算得上是雄厚的,抵御这些小股倭寇,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。

但因当时政治腐败,缺少军事训练,官兵吃粮不管事,根本不能打仗,临阵一触即溃。《明穆宗实录》卷4记载:隆庆四年二月丙寅,巡抚山东都御史靳学颜上疏曰:边兵、京兵、留都之兵、腹内卫所之兵,“此四兵者食坐则同,而缓急之用异焉……往时刘贼(指刘六、刘七农民起义军)起霸州,无几竖子耳,举中原之卫所而不能当,至不免于边军之调。嘉靖中年,倭寇发海上,5000余人耳,转掠十余府,至应天门外,而48卫者无一人出攫其锋,卒见夷于淮扬民兵之手,此其明验也。”

本来漕运总督兼任巡抚淮安、凤阳、庐州、扬州和徐州、和州、滁州四府三州地方,这里如果发生军事问题,照例必须领兵打仗。由于倭警,为了保证漕运畅通,漕运总督根本顾不上巡抚地方,更谈不上组织抗倭了。因此,朝廷后来又另设淮安巡抚。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丁亥,指派原任南京都察院右叅都御史李遂来淮任巡抚,提督军务,兼巡抚凤阳,专门进行抗倭。《明实录》卷452)。而漕运总督则单一地负责漕漕。

对于官兵的经常失利,淮安人民非常失望,人们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。面对这一现实,沈坤十分感慨,他痛恨官兵之腐败无能,又同情人民遭受的疾苦。他感到这正是他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时候了。在他安葬了父母以后,就毅然决定,

拿出他家全部积蓄,变卖了家产,树起抗倭大旗。他招募了1000多名青壮年,亲自组织训练,使这支队伍成为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。这比戚继光组建戚家军要早一年多时间。

现在,人们对于沈坤所练的武装都习惯称之为乡兵,《宝应县志·掖记》则称“沈状元家兵”。练乡兵保乡里,是当时一种风气,到处都有,沈坤练乡兵是顺应潮流,是一种抗御外侮,保家卫国的壮举,是值得称道的。

据说,沈坤的乡兵大营设在新城,在新城、河下设立路障,派人日夜巡逻。建了不少岗楼,楼下可以藏兵,顶上可以瞭望、报警,名之为“御倭屯瞭所”。其中有一座在湖嘴,一座在竹巷他家旁边。白天,他在新城内练兵,夜晚他独居城外,远视敌情。他经常教导他的部下,为了保卫大明江山,保卫自己家乡,要加紧训练,英勇杀敌,英勇善战,打了许多大胜仗。

沈坤的行动立即得到多方面的支持。阮葵生的七世祖阮淳(1506—1588),是个诸生,他将他家储集的粮食全部送给沈坤作为军粮。《阮氏家谱》卷上记载,阮淳字春泉,亦大河卫人。“性磊落,好施予,尤多隐德。沈祭酒十洲练乡兵御倭,公廩所储粟以饷军。”杨庚之《春育吃刺》卷1亦记载:“春泉淳磊落好施,沈十洲祭酒练乡兵御倭,春泉廩所储以饷军。”

沈坤的乡兵打过多少次仗,现已无法弄清楚。淮安地方志上记载了以下几条:

康熙《淮安府志·仕绩》:(沈坤)居母丧时,倭贼数千,犯淮口棘,公散家资,募乡兵千余,独居城外。倭纵火焚烧,官兵且却,公率乡兵,亲当矢石。射中其魁,乘胜追杀。城上人望之,呼曰:“状元兵!”

同治《山阳县志》卷21“杂记”记载:嘉靖三十四年,淮水溢。十月,“倭数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,时邑人沈坤方家居,散资募乡兵千余屯城外。倭纵火焚烧,官兵且却。坤率众力战,身犯矢石,射中其首,倭始退。

看来沈坤兼通武艺,能亲自教练乡兵,还能开弓亲自射中敌首,文武双全,真不简单!《江南通志》记载同上,并且还说:“乡兵乘胜追击,“城上望之,呼曰‘状元兵!’未几,倭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,焚掠尤惨。坤极力会战。”

沈坤的乡兵从此被人称之为状元兵,名声大振。所谓会战,当指状元兵与倭寇作战,或者与官兵会同与倭寇作战。

《乾隆淮安府志·兵戎志》:“三十六年三月,倭犯淮安府诸县。《庙湾志》:时贼首麻叶、陈东、徐海皆已死,江南、浙西诸寇略平,江北之倭自金沙登岸犯如皋、泰州,复犯天长,趋盱眙、泗,入清河、安东,又犯高宝至淮,倭夷二十二船从泗而下,焚杀尤甚。沈坤率乡兵悉力会战,大破之。倭乃溯东乡,由盐城至庙湾。

《重修宝应县志·掖记》记载:世宗嘉靖三十六年“五月七日己刻,倭从高邮至宝应,

任务交给孙国喜。孙国喜对彭敬波连打两枪,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。

惩治彭敬波这一着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。一些地痞、汉奸、特务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,伪乡长、保长也老实得多了。在那以后的二年多时间,平桥镇伪镇长虽先后更换为张鹏仙、王建和、邓殿高、管寿生、董兆忠等五、六人,但交通站仍能比较顺利地完保护送任务。

交通站常驻利民桥。利民桥与平桥南头的火星庙、东南的大成庄或东西一条直线。护送路程近,因而交通站经常在这一带执行护送任务。平桥特务队在特务头子翟六麻子带领下,多次到这一带骚乱,抢粮物、造谣言、奇情怪。对这群害群之马,交通站配合联络站和区队、联防队,给予了有力打击。平桥特务队由二十多人组成,成员大多数是土匪、汉奸、地痞、流氓。彭敬波的可耻下场,使特务队人员成了惊弓之鸟,恐慌不安。翟六麻子尤为突出,但秉性难改,暗中继续搞罪恶活动,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。林集区队和交通站多次捕捉翟六麻子未成,说来也巧,区队在第二次捕捉平桥镇长李之林的过程中,从地板下面发现了翟六麻子,立即将他逮捕,后经淮宝县政府批准,处以死刑。1943至1944年一年多时间里,平桥特务队先后被捕捉执行枪决的有:马春生、董学海、王建本、沈九、管小五子等。至此,特务队一蹶不振,不久便垮了台。

交通站的工作,多次得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鼓励。华中局交通科科长邓寅冬,在华中交通工作会议上,专门表扬了林集交通站斗争机智勇敢,工作大胆细心的革命作风,赞扬交通站取得巨大成绩。

1946年6月,解放战争开始,我军北撤。上级调李萍同志到陇海路设站,王建高到华中交通科任直属站长。至此,林集交通站已完成了历史任务。

越宿移舟淮郡,遇沈状元家兵,冲突复回。好事者渡河晋眺之,遂纵火焚7日不绝,公私庐舍殆尽,杀掠数千人。至十七日挖此盐坝乘水放舟而去。郑綏有记倭寇五古一首云云。当时沈状元家兵能却敌敢如此,信乎,十洲先生之功业与淮俱永矣。”

此外,吴玉搢的《山阳志遗》卷3、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卷21等人私家著作中也有记载,大体与此相同。都说他们还曾在姚家荡大败倭寇。姚家荡在山阳县顺河乡境内,即今淮安区官路、丁姚、胡宋三村之地。如果说从乡兵只能在本本地作战来讲,这还算是在本本地的。从战争需要兵力来讲,素有战斗力的乡兵状元兵也当然会使用起来。沈坤与李遂肯定有过“会战”,即有过合作。李遂对沈坤评价很高,说沈是“才兼经略,功收御侮”。这说明他们不但有过合作,而且合作的很愉快。

抗倭胜利结束之后,官府与沈坤状元兵将姚家荡战场的倭寇尸体弄到一起,挖了一个个深坑进行集中埋葬,上面筑起高墩,名之为“埋倭山”,也有人称之为“埋倭墩”,遗址仍在今顺河乡丁姚村第五组,后来那里开掘了一条苏北灌溉总渠,将一部分划到渠南复兴乡墩邵村境内。埋倭山显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,凡是侵略我国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。